

---

November 2018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 A Study of Western Theory as Doctrines and a Discipline

Jinghua Li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Lin, Jinghua. 2018.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 A Study of Western Theory as Doctrines and a Disciplin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8, (6): pp.76-8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8/iss6/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文学理论的国际政治学：作为学说和作为学科的西方文论

林精华

---

**摘要：**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的《文学理论》(1949年)刊行,标志着欧洲文学批评经由美国迅速转换为文学理论,即英国注重字词句细读的新批评转化为注重语义结构分析的美国新批评,发现并激活俄苏形式主义遗产,继而出现符号学、结构主义、阐释学、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与这些在表述上显示出科学性的理论一道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转化而成的马克思主义在欧美方兴未艾,伴随女权主义运动而来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以及持续充满活力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批评和文化研究等以深刻批评资本主义若干问题著称的理论。但它们皆产生并兴盛于冷战岁月:此时苏联完善并强化一整套共产主义学说,美国主导下的“西方”为应对苏联反映论文艺学威胁,使原本只是个人经验性“文学批评”,转化为学科和课程体系的“文学理论”。由此,得益于冷战格局而兴盛起来的文学理论学科,就常常和不关乎冷战意识形态的具体文学理论冲突,有关文学批评的争议不断。但冷战以苏联及其反映论体系的失败而结束,西方文论也和“历史终结论”一样获得合法性。在后冷战时代,如何使这种饱受争议的理论合理扩展,成为近40年来西方文论界最为关心的话题,但“后理论”本身也充满着国际政治学考量。

**关键词：**西方文论； 冷战； 学院制度； 政治学； 国际政治学

**作者简介：**林精华,俄语语言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燕京学者、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俄罗斯问题、俄国文学批评及其与欧美文论之关系、文学理论与国际政治之关系等研究。通讯地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系,邮政编码:100089。电子邮箱:linjinghua2002@hotmail.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剑桥俄罗斯文学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9]阶段性成果。

---

**Titl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 A Study of Western Theory as Doctrines and a Discipline

**Abstract:** The event of the publication of 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s *Theory of Literature* (1949) signals that European literary criticism was transformed rapidly into literary theory by American scholars. To be more specific, from then on, British New Criticism that emphasized close reading was replaced by American New Criticism that valorized analysis of semantic structure, and Russian formalism was rediscovered and reactivated in this process. Afterwards, more theoretical schools sprang up, such as semiotics, structuralism, hermeneutics, post-structuralism, deconstructionism, and so on. And along with the scientific literary theory, many other theories, like Western Marxist criticism, feminism, gender studies, new historicism,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academia, came out and flourished during the Cold War. At that time, the Soviet Union had established and reinforced a set of Communist theory. And in response to its reflection theory, U.S.-led “Western countries” turned “literary criticism” based on critics’ individual experience into “literary theory” as a discipline with a curriculum system. Therefore,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ry theory, whose blossom was a result of the Cold War, and specific literary theory, unaffiliated with ideology of the war, were constantly in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re was much controversy about literary criticism during the Cold War. But as the war ended with the upheaval of Eastern Europe and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theory of reflection failed,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like “the end of history” theory, finally became legitimat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t is a major concern for western theorists to develop the disputed theory in recent 40 years, but post-theories’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uld not be ignored.

**Key words:**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e Cold War; academic system;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uthor:** Lin Jinghua, Ph. D., is a Yenching scholar at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and research fellow of the Center for Russian Studies as a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Russian issues, Russia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an literary criticism,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ress: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ol of Litera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Email: linjinghua2002@hotmail.com This article is fund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14ZDB089).

韦勒克《文学理论》(1949年)一经汉译(1984年),便迅速启动了使主导中国长达近40年的苏联文论体系轰然倒塌的程序,自此西方文论在中国迅速壮大成超级学科;同样,自苏联末期以来,苏俄文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莫斯科大学教授切尔内茨(Л. В. Чернец, 1940年-)的《文艺学导论》(1997年, 2004年)、其同事哈里泽夫(В. Хализев, 1930年-2016年)的《文学理论》(1999年, 2002年)、国立萨拉托夫研究大学教授普罗佐罗夫(В. В. Прозоров, 1940年-)和叶琳娜(Е. Г. Елина, 1952年-)的《文艺学导论》(2014年)等等,从概念到结构皆深受西方文论影响,哪怕托马舍夫斯基(Борис Томашёвский, 1890年-1957年)的《文学理论,诗学》(1925年)等也重发生命力。

然而,这种改变了中国和苏俄文学理论的西方文论,从学说发展成教材、演变成课程、膨胀成学科,肇始于二战后不久,并伴随冷战进程而迅速繁荣起来,其声势浩大持续到1990年代初,真正成就了所谓的“文学批评时代”。但关于文学理论危机之声不绝于耳:从莱文《危机中的文学批评》(1955年)、桑塔格《反对阐释》(1964年)、皮卡尔《新批评或新骗术?》(1969年)、古德哈特《文学批评的失败》(1978年)等,到肯纳普和麦考斯《反对理论》(1982年)、奥尔森《文学理论的终结》(1986年)、柯南《文学之死》(1990年)、卡因《文学批评中的危机》(1990年)等都多方面抨击了“文学理论”背离文学审美性和文学教育的宗旨。诡异的是,苏联解体所表明冷战结束,使这些饱受争议的文论和西方其他理论一样,获得向全球扩张的合法性,西方文论界却对其争议不断,从哈罗德·布鲁姆《不成熟的预言:文化战争中的文学之论》(1991年)、特里德尔《文学批评十年:危机中的文化》(1993年),到伊格尔顿《理

论之后》(2003年)、罗南·麦克唐纳《批评家之死》(2007年)、巴厘《文学理论之终结》(2016年)等普遍认为“文学理论”时代已然过去,进入“后理论”岁月。而如此多的争议,却未妨碍文学理论继续成为独立于文学的自足体,还持续排斥学院之外的公众对文学之见解等,这样的情形令业内人士无所适从,在学界之外则无人能知晓其所是。

然而,争议多限于理论本身,很少回到“文学理论”诞生的冷战时代。实际上,欧洲文学批评在战后突然转化为文学理论并兴盛起来,远不只是在时间上和冷战相吻合,按密歇根大学教授希伯斯《冷战文学批评与怀疑主义政治学》(1993年)所反思的,冷战史还包括“对声称真理和谬误等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关于现代批评的方方面面一直被冷战强有力地影响着,但文学批评史就根本未对这种影响进行任何形式地查考。现代批评根源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哲学,以及从柯尔律治到艾略特的诗歌批评这一线索,但随着新批评出现,学院派批评则越来越被视为现代批评。新批评始于1920—1930年代,但繁荣和冷战紧密相联,因战后人口暴增和教育高速增长,促使大学扩大人文学科教育规模,文学理论由此获得体制性地位”,并因聚焦于自身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便再生出批评特点(Siebers 29-30)。其实,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1990年)稍早已指出这类情形的具体案例:1930年代国际性现代主义运动呈现出社会主义倾向,“随着抽象表现主义之崛起,现代主义走向了非政治化,讽刺性地预示着它被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所收买,成为冷战中的意识形态武器。艺术充满了异化与焦虑,充分表达了暴力的分裂与创造性的破坏,却被当作美国信奉表现自由、粗朴的个人主义、创造自由的杰出样板”,当时美国艺

术证明了在受共产主义威胁的世界上,“美国乃自由理想之堡垒”(Harvey 25)。此后坎宁安《理论之后的阅读》(2000年)断言,“文学理论加速回归,的确强化了文学批评的价值。毫无疑问,在我的心中,二战之后,文学理论确实使文学研究再度焕发生机(revitalized)”(Cunningham 38),伴随着1940年代新批评影响力的急剧衰退、语言学转向,文学理论迅速繁荣起来,这种情形持续到1980年代末。而这种延续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宏大价值观和表述方式之举,是通过现代学术制度和大学体制而进行的。和冷战时代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在措辞上看不出是针对苏联意识形态,而是构想各种看上去比苏联话语体系更科学的具体理论。就是在此等格局中,普遍的文学批评范式迅速建立起来,“冷战批评家运用文学和其他美学形式,把他们相信在战后世界不可能出现的和谐与规则加以象征化”,从而使批评方法本身魅力四射(Siebers 35)。

这就意味着:若不明确作为学说、课程、教材和学科的文学理论是二战后的特有现象,且和冷战进程以及从冷战转换为后冷战之历史变迁息息相关,那么无论我们怎样去发掘韦勒克《现代文学批评史》、布鲁姆主编11卷本《批评的艺术:从古希腊到当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1985年—1990年)、布鲁克斯主编9卷本《剑桥文学批评史》(1989年—2013年)等鸿篇巨制之微言大义,也难以认识在如此充满生命力的文学批评方法进程中何以出现那么多文学研究危机之论,因为它们讨论的是文学批评理论经典,是以文本形态存在的文学批评方法及其实践。如此一来,只限于既有的文学理论经典本身,就无法洞见那些文论文本所产生的复杂历史情境——它正是问题之来源,如1950年代在美国发现、“复活”并被追溯为重要批评流派的俄苏形式主义,乃因它是苏联反映论所排斥的,为对抗苏联,西方批评界正好把这种科学化的批评方法纳入其文论体系中,并认为它肇始了西方文论;<sup>①</sup>继而,我们也无法正视争议不断的文论,为何至今仍是英美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的重要课程,也被欧洲大陆各重要大学母语文学系重视。可见,须回到历史,方可释怀西方文论的困惑:论述方式或使用概念普遍晦涩,非专业人士难以卒读,专业人士要自如运用这类艰涩理论也未必没有困难,却能在高度强调政治正确的冷战时代广为流行,在冷战时代后期就开始在全球蔓延——这种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文学理

论究竟是怎么回事?

—

众所周知,是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及其作为教材、课程,并得到耶鲁大学等一流大学母语文学系和比较文学系的支撑,才开始成就卡勒《论解构》(1982年)所论的作为学说的文学理论——“近年来欧洲哲学,如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等,是通过文学理论家而非哲学家入口到英美的。就这一意义而言,正是文学理论家,在建构‘理论’这个文类中,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卡勒4)。并且,这样的“文学理论”是历史过程的结果:随着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推动民族国家及民众对其认同成为潮流,脱胎于神学教育的欧洲各大学,先后减少神学、语文学、修辞学等,增加本国语言文学教育比重,并于19世纪末,因提升本国公民家国情怀的文学史、文学批评而日益获重视,和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一道成为大学人文学科中的核心课程。相应地,大学教育制度确定了学术自由以及具体系所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内容等方面,避免教会和政府的干预,即便是英国和欧洲大陆多国仍有国王或王后学院、天主教大学或基督学院,也不受神权政治/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控制。作为移民之国的美国比欧洲更充分地世俗化,文学教育的中立化大为普及。费伊勒拉《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1925年)高度评价这种保持政治中立的文学批评机制。<sup>②</sup>1940年兰塞姆等五位批评家、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 1906年—1994年)等五位教授分别在《南方评论》《凯尼恩评论》发表笔谈《文学与教授们》,与英国文学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和卡莱尔、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等人主张相当,皆强调文学批评的审美教育功能。但冷战局势改变了大学教育及其学术制度,无论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都在“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利用遏制苏联的战略所拨付的大笔财政投入,得到巨大生存和拓展机遇,并如宇航、计算机、法学等等获长足发展一样,人文学科也成为彰显西方自由的又一领域。在此过程中,在美国大学的英文系和其他语言文学系及比较文学系,文学理论成为重要课程。

文学理论得到长足发展,更得益于冷战时代整体氛围:政府和基金会加大对学术研究的经费

支持,如1965年美国政府设立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使文学艺术的生产、研究成为冷战的一部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研究在申请基金上易获成功,这正是文学批评最具繁荣的时期;大学文学教育制度及学科所建立的学术共同体,更被注入活力。按当代爱沙尼学者格丽莎科娃等编写的《二十世纪人文学科的理论学派与学术圈》(2015年)所称,“学派、学术圈和其他学术共同体,已成为20世纪思想运动的主要力量。它们培养了在学科或学术传统之内循环流通的理念,因此改变了知识探究的状态和方向[……]人文学科中的学派与学术圈,最经常的是产生于共同兴趣和工作日程,在研究或书写中有共同的独特性,是比体制关系更为紧密的非正式密切合作[……]学派与学术圈出现于更广泛的知识分子运动,与他们那个时代破坏性事件——战争、政治博弈与政治迫害、移民和大灾难等并非无关”(Grishakova and Salupere ix)。此非后加入西方阵营的东欧学者的一孔之见,而是有历史根据之论:文学理论在战后欧美发展和膨胀过程中,学界本身作为学术共同体的贡献力功不可没。帝俄时代就形成成熟的学术共同体,如形式主义者当时仅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他们敢于挑战俄国学院派传统。爱亨鲍姆《关于形式主义朋友圈问题》(1924年)就认为,形式主义之成功,首先仰赖于他们在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所形成的同仁圈;但其在布尔什维克政权时代遭到排斥、被迫解散,未必完全是苏俄意识形态所致,因形式主义屏蔽俄国文学中的国家意识,与传统俄国文学批评产生冲突,与192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国际语境不吻合,雅克布逊和特鲁别茨柯依等成员被迫流亡欧洲,在布拉格重组学派,此后在欧美找到学术位置,借此培养门生,他们过去的学术遗产由此得到积极的发掘、彰显。同样,德里达背离法国年鉴学派和语言学传统的语言哲学理论,被法国哲学界所排斥,自1960年代始在美国文学批评界流行开来,并酝酿成全球性的美国解构主义批评潮流:此举表面上肇始于保罗·德曼在《盲点与洞见》(1971年)、《阅读的寓言》(1979年)等著作中践行其后结构主义理论,实际上更得益于德曼作为耶鲁大学法文系主任(1974年—1977年)、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和系主任(1978年—1983年),开设“比较文学”和“修辞性阅读”等系列课程,给学生和暑期班学员开设“尼采的修辞理论”“浪漫主义文学家自传”等等课程,直接扩展其学说、提振其声

望;<sup>③</sup>其讲稿则成就其诸多重要著作的有关章节,如1983年春天在康奈尔大学演讲《抒情诗中的人神同形同性与比喻》就成了《浪漫主义修辞》(1984年)第五章,诸如此类无疑进一步扩大其学术影响力。并且,通过文学教育制度方式,德曼的课程内容对训练研究生的修辞性阅读能力,去适应冷战时代建立普遍理论的学术趋势极为有效,从而使斯皮瓦克和萨姆韦伯、芭芭拉·约翰逊等门生在这种学术体制下取得巨大业绩,很快占据欧美许多著名学府的重要学术职位。这样一来,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经美国广泛流行开来,出现了米勒所公开声言的情形——“解构主义在美国的适用和挪用,产生了某些成果,是美国所特有的。正如德里达反复说的,他在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远胜于法国。解构主义乃真正的美国事情”。<sup>④</sup>进而导致,二战时德军占领比利时,德曼在亲纳粹的《晚报》等报刊发表二百余篇文字,自1987年开始被陆续披露出来,震惊学界。加拉格尔《盲点与事后诸葛亮》(1989年)就疑惑道,大屠杀至今让人心有余悸,而德曼为掩饰历史罪行而热心于探索去历史语境化的修辞学阅读,“我们尚未知道要从保罗·德曼的主题中学到什么”(Gallagher 207)。紧接着,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指出,“在哲学前沿,解构主义已被海德格尔和德曼同情纳粹的冷战置于守势。作为解构之灵感来源的海德格尔,对于纳粹主义具有不思悔改的依恋,而德曼则是解构主义最有才华的实践者之一,他具有反犹写作的阴暗历史,这些都证明了其严重窘境。有关解构主义乃新纳粹主义的指责,有趣的并非其本身,而是对这种指责的辩护”(Harvey 357)。对其辩护的不仅有米勒和德里达,更有德曼的门生,如后任加州大学尔湾校区教授的沃敏斯基在批判德曼运动高峰过后不久,就出版据德曼的课纲和讲义而成的文集《审美意识形态》(1996年)。这种制度性行为,虽未能使持续近十年批判德曼的运动动摇解构主义理论的地位,但欧美学界把解构主义理论与德曼的修辞学阅读方法进行了区分。可见,学院制度成就了冷战时代文学理论在西方的建构、践行。哪怕德里达一直把解构主义理解为激进化的马克思主义,但伊格尔顿认为,不管德里达说得对或错,解构主义在东欧一些知识分子圈子中都一度被当作反共产主义之异见的符号。<sup>⑤</sup>

问题是,俄国形式主义在西方的复活、德曼及

其解构主义的学术地位未因其早年亲纳粹行为而被颠覆,在冷战时代绝非特例:新批评在美国的转型、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在法国的兴起以及在英美的普及、读者反应理论在德国的产生及在欧美的流行、文化研究从英国和欧陆被孕育出来并在美国发展成全球性的重要学术领域等等,同样受益于冷战时代推动的现代学术制度以及大学文学教育,并和欧洲殖民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文学批评传统关系密切。其中,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年—1834年)对阐释学之兴致肇始于他应邀翻译英国王室海军陆战队中校殖民官柯林斯(David Collins, 1756年—1810年)的插图本《英国殖民地在南威尔士的报告》(1801年),该书记录作者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邂逅。施莱尔马赫对如何才能理解这种民族信仰念念不忘,由此“阐释学艺术正是缘起于一场在殖民地的邂逅(a colonial encounter)”(Eagleton 23):直观上是科学化的、实质上源于西方殖民主义的阐释学,使欧洲解释《圣经》的传统,在冷战时代演化为非历史语境化的解释理论。经由学院制度而使文学研究变成对西方文化遗产、价值体系之确认,如在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组织华兹华斯去世百年纪念会上,特里林《反对自身:九论文学批评》(1955年)声言,“若经由大学,华兹华斯仍不能被我们记住,那么他就不可能被人想起”(Trilling 118)。这也就意味着,日新月异的西方文论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牛津、剑桥、伦敦、爱丁堡等大学英文系的,巴黎高师、索邦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研究院等以及柏林大学、都灵大学、乌特勒支大学等等语言文学系的学者们,对文学批评方法的探索成果,通过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伯克利和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等英文和比较文学系,转换为课程(及内容),以及这些系又针对战后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快速发展所涌现的问题,深化女性主义、黑人研究、后殖民批评、文化研究等学说。在美国学术制度支持下,牛津大学教授加德纳《职业的文学批评》(1953年)认为,作家、诗人和批评家等作为文学行家对文学的批评意义,很快就被职业文学研究者的著述所替代,因后者占据了重要的文学研究职位,如布鲁克斯借助耶鲁大学教职,对《麦克白》进行语言学细读之名作《精致的翁》(1947年),产生了学院之外文学家的评论难以比肩的影响力。<sup>⑥</sup>

重要的是,直接刺激战后文学理论勃兴的学术制度,其本身乃冷战的产物。冷战格局,促使

“自由世界”结成共同的“西方”,以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抵制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如法国残酷镇压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英国重组前殖民地国家而成为英联邦等,欧美各国热衷于建构掩饰殖民主义历史的各种理论,进而孕育出欧美学界积极探索所谓普遍理论之大潮,使欧洲大陆、英美分别发展的文学批评方法汇集到美国并被锻造出有可操作性的文学理论。而且,法国学界热衷于探索文学研究方法论,中情局也由暗中监视转化为大力支持、推广,<sup>⑦</sup>导致1965年米勒在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组织的文学批评研讨会上声言:“文学研究的继续发展,一部分动力将来自各种各样的欧洲批评。美国学者吸收并同化欧陆批评的精髓后,有可能从美国文化和欧洲思想的相结合中发展出新的批评”(Hoffman 71),从而使之不再只是“法国的理论”,而作为普遍价值观通行。1987年春季德里达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举办的“理论状态”会议上强调,把文学理论概念和术语视为北美产品,那只是从美国的特定位置上赋予其内涵的,却产生了普遍的影响力。<sup>⑧</sup>进而,我们也就明白了战后法国理论为何很容易在美国流行起来,再也难觅当年法国启蒙思想遭遇欧洲抵抗的情形。<sup>⑨</sup>

战后所形成的学术格局,正吻合冷战时代教育变革,按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2000年)所说:“国家要繁荣,就必须向其国民灌输适当类型的精神倾向[……]为了成为公民,我们必须成为人。国家让文化得到具体的体现,而文化则具体表达我们共同的人性。将文化提升到政治之上:先成为人而后再成为公民!这意味着政治须存在于一个更深层次伦理尺度之内,吸收教育资源并将个体塑造成性情温和、有责任感的公民,这便是公民阶层的辞令,虽有几分唱高调”(伊格尔顿5—6)。而战后美国在征募新兵过程却发现学生的学识训练不足,苏联又率先成功登月,这些都使美国不得不重振基础教育,强化对英语和历史的学识训练,以确保国家未来发展;<sup>⑩</sup>基础教育的这种变革,影响到大学教育改革,加大对人文学科投入,使各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的地位持续上升,出现了大批杰出的文学理论教师,“文学批评受到科系定位的影响,这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独特贡献。这种结构,使得大学明显鼓励各院系联合起来去争取生源和经费、创新发展”,“文学批评也深受大学职员构成比例之变化的影响。对特定标准和经济地位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男性而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早些时候,文学研究曾是上

流社会职业。挑战传统学者的新批评,仍多出自这一阶级的男性,但他们之后的批评家,随着冷战格局变化,其构成发生分化,如1969年美国著名高校英文系学者中犹太人占据了7—13%,女性学者和黑人学者比例也随着民主化进程,不断提升(Culler, *Framing the Sign* 26—32)。师资结构如此变化,与社会变革相一致,由此激发性别研究、女性主义、少数族裔等研究的日渐兴起,促成新历史主义率先在伯克利兴盛、解构主义在耶鲁繁荣,此情与这些研究转化为课程密切相关。

殊不知,这种情形直接影响了文学经典的重构。在冷战局势刺激下膨胀起来的文学研究界,更多不同族裔的学者(其中大量的是女性)参与其中,意外激发他们开掘出另一批经典,改变了经典序列及其理解方式。同时,政治正确使美国人不能轻易否定这种变革趋势,须正视“西方文化缘起于多元文化之中。西方文化起源于东地中海,这里汇集着中东和欧洲、希伯来和古希腊、闪米特和亚洲等不同人群。闪米特元素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展现。不仅古希腊从古埃及学到了很多,而且我们认为主要属于古希腊和罗马的作家们,如伊索、阿普列乌斯、泰伦提乌斯、圣奥古斯丁等皆属于事实上的非洲人。而且,即便是民族主义欧洲所发现的经典作家大仲马和普希金,也是非洲人的后裔。可以确信,他们成为经典就类似于欧洲化的犹太人,从斯宾诺莎和海涅到普鲁斯特和卡夫卡,并非因为他们是外来族群的出生和对这种事实的忽视”,而是时代确定经典的制度发生了变化(Fiedler 35)。费德勒《经典与课堂》(1993年)认为这种主张是有历史依据的:雷蒙·威廉姆斯这位把英文系与政治学紧密关联起来的重要人物,其《“英国文学”的未来》(1983年)就称,英国文学课程大纲从来就不是稳定的,而是变化着的,萦绕在人们脑子里的经典,由文学教学大纲所确定,形成了文学史版图,在实践中成就了“选择性传统”(selective tradition)。<sup>①</sup>的确,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就排除了《简·爱》《呼啸山庄》《特里斯坦项狄》等作品,而新批评课程塑造新一批高级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文学经典,英国小说家劳伦斯《美国文学经典研究》(1923年)、哈佛大学教授马西森《美国的文艺复兴》(1941年)等拟定了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序列,并成为1950—1960年代以来文学课堂上的重要内容。同样,杰洛瑞《文化资本:文学经典形成问题》(1993年)证实,经典和非经典的区分,越来越由

学术机构所确定,并直接影响到在每个时代的文学教育中,这种传统所确定的经典被误解为“伟大的传统”(great tradition)。<sup>②</sup>稍后,布鲁姆《西方正典》(1994年)更是主张,本源于宗教概念的经典,“如今已成了为生存而需在互相冲突的文本之间进行选择,不管你认为这个选择是由谁决定的:主流社会、教育体制、批评传统等”,“能成为经典的必定是社会关系复杂斗争中的幸存者,但这些社会关系无关乎阶级斗争。审美价值产生于文本之间的冲突;实际发生在读者身上、语言中、课堂上、社会争论里。很少有工人阶级的读者能决定文本的存废,左翼批评家也无法为工人阶级代劳。审美价值出自记忆,或出自若尼采所见的痛苦,出自追求更艰辛而不是便捷的快感所带来的痛苦。工人们充满着焦虑,转向宗教寻求解脱。他们确知审美对他们是一种烦恼,这就使我们体会到,成功的文学作品使我们产生焦虑而不是舒缓焦虑。经典也是一种习得的焦虑,东西方经典皆非道德的统一道具”(布鲁姆 8,14)。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新批评主导下的文学教育热衷于推崇现代主义,不是因其价值,而是要显示出西方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所具有的理解叙事复杂之作的修养。196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变化,不仅是因随着女权和黑人民权运动而兴起的女性文学、黑人文学或其他少数族裔文学等,更因大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黑人或其他肤色的教师,他们基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发掘出相应的文学经典,并把它们引入到语言文学教育课程体系。

可以说,战后西方文学理论的兴盛确如雷德菲尔德的《耶鲁的文学理论:美国的解构主义奇特案例》(2016年)所总结的:“在20世纪后期美国大学的体制性和专业化语境之外,‘文学理论’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学理论是学术机构事务的一部分,是专业化的教学”(Redfield 13—14)。这种情形是冷战时代变革大学教育格局所致,它改变了以个人经验方式存在的传统文学批评,而以学科方式成长起来,任何流派、著述、概念等皆借助学院制度才能拥有生命力,这既造就它们成为学院派内的知识自我循环,又促成文学理论知识在西方的膨胀,成为超级学科。

## 二

西方文论在战后突然膨胀起来,卡勒《文学理论》(1972年)认为,“文学理论不是一系列毫

无实质的空洞概念,而是一种制度性力量。理论存在于读者与作家的共同体之中,作为话语实践,不可避免地与教育和社会制度纠缠在一起”。借助制度性力量,自1960年代以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三种理论模式,即对语言、再现、批评范畴之反思的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分析文学及批评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和性角色的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和同性恋理论(Queer theory),以及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的话语实践,各涉及身体、家庭、种族等许多对象,但它们不同于过去关于这些对象的认知(Culler, *Literary Theory* 123)。这样一来,正如整个人文学科在冷战时代得到超常发展一样,迅速膨胀起来的文学理论成为冷战时代理论建构之一部分,利奇《与理论同在》(2008年)对此主张“要理解今日文学批评和理论,就须考虑到诸如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被过去时代的主流理论所控制的情形”(Leitch 2)。的确,“文学”概念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在这期间意外地被重构,出现了巴里切利和吉鲍尔迪《文学的相互关系》(1982年)所说的情形,“自浪漫主义以来,文学和政治之关系,就成为现代美学须面对的最敏感和矛盾的问题。很明显,在文学和政治学之间互动的学生们,是在困难期从事思想危险的事业,因他们着手探索的文化景观是如此的复杂和不确定,充满着矛盾、悖论和陈词滥调。在近两个世纪中,关于文学和政治之争,远没有解决问题”,“今日许多批评家断言,文学阐释不应回避政治问题。即便其中某些批评家把批评最终目的视为对文学作品之固有意义的再发现,他们认识到,某种辅助的外在方法(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之作用是有限的,哪怕许多批评家仍有不愿把文学与政治直接关联起来的想法”(Barricelli & Gibaldi 123)。此说指出文学批评方法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文学批评再度与政治关联起来,这类看似倒退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冷战改变了“政治”意涵。战后西方为对抗苏联,有意识建立自由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推动科技革命,意外地促使后工业时代到来,导致在文学艺术领域和审美实践中广泛流行后现代主义。这种原本是和冷战息息相关的现代性后果,对危及西方正统的政治正确未必没有破坏力,却被托夫勒《未来的冲击》(1970年)和《第三次浪潮》(1980年)、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后工业社会来临》(1973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等,视为人类文明普遍的发展方向,大加彰显,尽管这些著作

当时引发美国左翼知识界的激烈反弹,如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认为,19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盛行,足以证实了西方没有意识形态、科技救国之说的谎言。相应的,这种用来显示西方“发达”“自由”的后现代主义,成为文学批评方法探索的又一背景,“真理、历史和价值之类很可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概念,但法国理论试图尽可能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行事”(Lotringer and Cohen 5),从而促使用来瓦解假想敌之“宏大叙事”的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批评方法,更被赋予了合法性。虽然霍尔《解构大众文化笔记》认为,把文学与政治学两个术语放在一起表述,困难重重,<sup>⑬</sup>但因为冷战以对手失败而告终,莱恩《文学与政治学》(2013年)就认为,“文学”与“政治学”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分属不同领域,各有独立意义,如首相的任务和获得布克奖的小说家的任务是两码事,“但它们彼此间有关联、多元互动、各自的边界和复杂性。大量的文学作品言说的就是这种复杂性”(Laing 16)。由此,我们也明白了冷战期间西方有意识建立和苏联阵营不同的言说方式,政治正确通过学术制度变得更加隐秘,诚如詹姆斯《政治无意识》(1981年)所说,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学》(1968年)把民间故事分成不同叙述类型、格雷马斯结构主义把文学文本当作符号,但这类“科学”分析的对象是关于人的叙事,为了分析目的而消除人之存在是有违常理的,因而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批评,断言在文学批评方法探索中“政治无意识”无处不存在。这正吻合上述贝尔等人著作以及乔姆斯基《美国的力量和新官僚》(1982年)所讨论的话题,因为冷战的确重建了西方社会结构,并把知识分子变成专业工作者,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应运而生,由此西德思想家穆勒《反思后现代主义》(1975年)声言,“我不能把政治问题与后现代主义问题区分开来”(Muller 57)。随着时间延伸,阿拉奇《后现代主义与政治学》(1986年)进一步解释道,“在国家和法律层面,政治是切实存在着的,如‘生殖政治学’(politics of reproduction)就是要为堕胎合法化而战,‘性政治学’(politics of sexuality)是因法律禁止特定的性行为或无法平等地保护有些人奇特的性要求,‘性别政治学’(politics of gender)则因女性已有法律上的平等,就要去获得就业和薪资平等权力。个人之所以成为政治性人物,是因对诸多公共领域的救助之焦虑——那些领域长期以来被视为私

人空间,包括教授期待的秘书煮咖啡、学生能容忍批评”(Arac, *Postmodernism* xxix)。也就是说,文学理论之兴盛就得益于学院制度提供的权力。然而,三年后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1989年)发现,这种趋势有增无减,“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转移:从对文学进行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关系)。通过兴趣的转移(或许令人费解,却无疑是十分确定的),大大地增强如拉康的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思想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文学理论之号召力。随之而起的是普遍回归:回到新批评之前传统的传记、主题和文学史方法上来”,有人指责新批评灾难性地缩小了文学研究范围,有人不能容忍对这种研究的轻蔑,这些各显示解构批评的黄金时代已过去,“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上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男人和女性在社会的真实状态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科恩 121—22)。

重要的是,冷战时代的西方政治就是国际政治,文学理论的政治学也不限于欧美的国内文学现象,而是在不触动政治正确的背景下,探索文学理论并在文学教育中推行。正因为如此,“法国理论带给美国的是语言政治学,那是显而易见借用于巴赫金和其他人的思想。语言政治学意味着对任何话语模式的破坏,拒绝对含蓄的假定进行解释;其强制性所指,把语言变成了始终在表现着的命令系统,尽管该命令系统不断分解着图书、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而它们中的每一个则扮演简化命令系统的角色”(Lotringer and Cohen 5)。并且,文学理论研究者受益于冷战国际政治格局,如霍恩·戴尔《文学批评制度》(1982年)所言,其本人绝大部分文章受到德国社会和文学之启发,“很明显西德是发达的工业化社会,属于西方世界一部分,在政治和文化上与欧美其他工业化社会紧密相关。我不希望减弱民族传统,因为它毫无疑问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也注意到这个本质性问题,是所有发达工业社会共同的话题,虽然表现形式五花八门”(Hohendahl 13)。本来,诸多战争和贸易的血泪

史,使美国和欧洲之间矛盾难以化解,并导致“英美和欧洲大陆文学批评及哲学之间存有间隙,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是通过‘翻译’来处理的,这不仅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字问题,还是更重要的文化迁移问题”,“在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关系上,长期以来似乎就存在着一些困惑,甚至困扰(disturbing)”,并举例说,布鲁克斯(Van Brooks)曾担心美国崇尚工业文明的文化,会使美国人无法从欧洲文明中找到自我,“我们太关注文学批评在国家生活中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Arac, *Yale Critics* x)。然而,建立共同对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则能结成统一的“西方”,如1934年创刊于纽约的《党派评论》,从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平台转换为文化冷战的阵地,战后就把美国和欧洲关联起来,萨特、加缪、波伏娃等欧洲知识分子很乐意参与其中;<sup>④</sup>建立共同的“文学理论”,成为促进美国和欧洲有效汇通的又一条路径,“我们持续关注,造成英美与欧洲大陆文学批评之间隙的最大语境,根源于不同的社会经验。这个间隙,使隔阂甚深的两者之间能展开很有意义的对话,耶鲁批评家们在这种对话中发出重要声音,这让欧洲看到了难以理解美国读者的真相”(Arac, *Yale Critics* ix)。由此,梅罗德《文学批评的政治责任》(1987年)断言,“北美文化很享受国际影响力的语境”(Merod 38)。

正是在此基础上,欧美出现了一系列讨论文学政治之关系问题的著作:欧文·豪《政治与小说》(1970年)、奥曼《美国的英语:一种激进的职业观》(1976年)、伦特利恰《文学批评与社会变化》(1983年)、米歇尔《阐释的政治学》(1983年),以及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1975年)、《意识形态与文学形式》(1975年)、《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6年)、《审美意识形态》(1990年)等,讨论文学研究或文学教育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正是基于政治无处不在的批评话语,多利摩尔和辛菲尔德《政治的莎士比亚》(1985年)认为莎士比亚本身有着明显的国际政治线索,并影响着此后的英国文学,如《李尔王》《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等伟大经典,其叙述和冲突是围绕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或其他王国的政治事务展开的;弥尔顿《失乐园》是关于政治冲突的长诗而非无关政治的贵族史诗;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直接诉诸的是当时政治及其进程问题。相应的,孕育出大量的关于文学政治学研究之作,如西里曼

《诗歌的政治经济学》(1998年)、巴特勒和杰洛瑞及托马斯合作主编《何谓左翼理论：“文学理论政治学新论”》(2000年)、波扬《论诗歌与政治学》(2008年)、罗森《斯威夫特时代的文学与政治》(2007年)等,巴瑞希《保罗德曼的双重人生》(2014年)甚至提出“比较文学的政治学”(politic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概念。基于如此事实,布克《文学和政治学百科全书》(2014年)声称,“过去几十年,凸显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意义,乃文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这种情形,在后冷战时代重新把西方历史上的文学和政治关联起来”(Booker ix),并津津乐道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性批评、后殖民研究、非/亚裔美国文学等概念,甚至认为法兰西学院其创立(1635年)、发展、工作(编纂辞典)都和政治相关,“苏格兰文学”条目则解释说该文学发展仰赖苏格兰教会的信仰和民族意识。

与此同时,从政治学角度对许多重大社会现象进行文学理论的讨论,成为期间重要现象。即便是1960—1970年代开始兴盛起来的女性主义批评、同性恋研究,也是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下展开的,如波伏娃《第二性》(1949年)、埃尔曼《想想妇女们》(1968年)、米利特《性政治学》(1970年)、西苏《美杜莎的笑声》(1971年)、伊利格瑞《不是同一个性》(1977年)、斯帕克斯《女子的想象》(1975年)、莫尔斯《文学妇女》(1976年)、普拉特《妇女小说中的原型模式》(1981)、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姐妹到莱辛的英国妇女小说家》(1977年)和《女性疾病:妇女、疯狂和英国文化,1830—1980》(1985年)、吉尔伯特和古芭尔《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年)与《诺顿女性文学选指南》(1985年)、克里斯蒂娃《妇女的时间》、玛丽·伊格勒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指南》(1986年)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1年)等力作皆然。原本是要诉诸女性问题在民主制下仍未被有效解决的女权主义运动,却因这些著作演变成彰显西方女性自由解放的普世价值观,即如鲁尼《女性主义理论的文学政治学》(2006年)所言,“常识已使我们确信女权主义政治与女性主义理论是直接关联的”(Rooney 73),反过来,也使这些著述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同样,族裔和身份研究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则与美国为彰显有色族裔和白种人平等的黑人民权运动之国际意义有关,按科恩《文学理论之未来》所论,“女权主义和黑人理论家是大规模政治和

文化运动一部分,他们旨在要求平等,在市场竞争、社会空间、政治舞台和教育机构等方面一律平等。因而,女权主义和黑人文学理论家,反对那些直接或间接维护文学研究现状的、得到公认的理论。这些理论家由于愤然反对那种排斥异己的做法,反对那种蔑视或否认其他可能存在的文学传统,就显得极有分量。而当这类理论家或持赞同观点的人,进入学术领域并进行理论建构时,他们对业已确定的理论及排斥异己的传统做法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他们把文学‘理论’与新的目标联系在一起,重新对理论加以界定”(科恩 2)。也就是说,女性主义批评和族裔研究作为文学批评方法,原本是英法通过政治正确处理殖民主义遗产的现实政治行为,不同于共产主义阵营直接把妇女解放和民族平等当作制度设计的一部分来处理,但西方却把自己的做法言说成普世性理论。

意味深长的是,冷战激发文学理论把政治作为学术问题的关注对象,远不是因柏拉图《理想国》确立艺术事关国家安危之古典传统,更有克拉克《政治唯名论与文学批评之性能: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政治学》(1989年)所说,“把文学研究与政治行为关联起来,自阿诺德宣称文学批评须保持‘公正’与远离庸众关心的谋生和政府治理以来,就已成为问题。阿诺德反对被视之为自我放纵的自恋性浪漫主义,认为文学批评,真正的批评服从的是自动去尝试了解已知的和深思熟虑的世界,一个与实践、政治和民主事务无关的世界”,但其《目前文学批评之功能》问世百余年来,文学批评却走向了他所谴责的方面,如1920年代白碧德等倡导回到把伦理学与美学联合起来的新人文主义,以赎回浪漫主义时代就已产生、后来消失的主题;1930年代盛行的两个M运动即政治上马克思主义(Marxism)、艺术中现代主义(Modernism),乃《党派评论》和《新共和国》创刊动力及其讨论的话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人文主义。<sup>⑤</sup>在如此态势中,文学理论探索背后隐含着政治正确的诉求,诚如赖安《马克思主义与解构》(1982年)所说,解构方法能开阔批评视角,超越文本与世界之间的本体论障碍、大学与市场之间的政治界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能观察到社会进程的政治意涵;稍后,奥尔森《文学理论的终结》坦言,“若文学考虑的是社会实践,而不是文本的构成,那么文学美学就应改变其关注焦点,要从个人心灵和个体创作之关系,转移到社会实践以及读者和作品都是社会实践因素上来。美

学判断的说明、美学特征、美学价值，必须进而要尝试描述文学实践的诸种概念，与这类规则制定之间的逻辑关系，即操控实践和建构识别可能的审美特征之逻辑关系”（Olsen 12）。

可见，文学理论学科的生命力，基本上得益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生态，并随着冷战进程而兴盛，诚如卡勒所言，“近年来文学研究还有一个趋势就是从欲望向批评政治扩展。这涉及文学作品自身的政治尺度，它们有促进变化、颠覆权威、包容社会能量之作用。文学批评，既探究文学与性、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权力之共谋关系，又涉及当时话语意识形态之批评、各种抵抗和再生的技术。进行批评政治的欲望，衍生出对文学批评制度和意识形态尺度之兴趣：对其政治取向的影响，与其许可和包容的制度之关系。一个流行的主题一直都是专业方式和大学教育结构驯化出激进的理论话语——若能得到制度性的结构调整，似乎它们固有的力量会得到释放”（Culler, *Framing the Sign* xiii）。由此，若不从文学理论的国际政治学角度认识保罗·德曼及其解构主义，在遭遇严重的政治伦理危机之情形下，何以仍有人在阐释、运用之，就难以理解其奥秘。而这种情形丰富了文学理论的存在形态和发展空间，使托洛茨基、卢卡契、本雅明和阿多诺等关于文学与政治之论，甚至如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法国政治理念》（1931年）政治学力作，皆成为文学批评方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从欧洲文学批评传统中转化而来的文学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普世性教育中，吸引着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不怀疑这类理论，从而使西方殖民主义时代审美遗产合法化。鉴于战后文学理论和冷战之如此复杂的关系，科恩认为，要解释冷战末期文学理论的变化方向，就需考虑到政治运动与文学理论修正之关系、其他人文学科与文学理论探讨之互动、寻求新理论与重新定义旧理论等。<sup>⑩</sup> 这也就是，作为学说的文学理论在具体表述上看似和战后政治无甚关联，却掩饰不了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是在国际冷战中得到迅速扩张的事实。

### 三

战后文学理论在欧美产生、发展，远不只是作为具体学说的文学批评方法，更有演变为课程体系、再壮大为超级学科的制度性难题。它在冷战国际政治进程下发生，却非冷战意识形态直接替代文学批评，而是通过缜密的学术制度和大学教

育体制之中介而推动的，并以其学术魅力在欧洲大陆、北美和英联邦产生影响力，但理论生产过程及背后的学术制度被巧妙地屏蔽，只是以学说方式波及到全球，使率先建立起来的苏俄文学理论饱受冲击，曾移植苏联文论的中国自冷战后期以来视之为前沿、发达的文学理论。

这种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西方文论，直观上有别于强调文学研究过程意识形态化的苏联反映论，显示出人文学科中追求价值中立、表述客观和对所在社会的批判精神。而冷战所塑造的学术制度，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大学教育体系，实际上趋于关注和现实相关的话题，导致作为课程和学科的文学理论，远比以具体学说姿态出现的文学理论要复杂得多。在科恩看来：1944年之前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大学人文学科教育要立足于阿诺德所说的人文主义，这种观点在各类大学的课程设计上得到了实践，包括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阅读等课程，就是要培养盎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白种男人，使之适合于从事法律、医学、公务员、实业、教育等高等专业工作，“培养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中产阶级白种女子，使之成为贤妻良母、出色的女性和献身社会公益事业的人。这个课程计划是：让你去一个受保护、与世隔绝之处，住上四年，在那儿念柏拉图、莎士比亚、布朗宁等大师杰作，吸收人文主义价值观，以备进入上流社会。人们一直把人文学科视为是主题研究和文体研究两种。人文学科课程有助于吸收从《圣经》和古希腊文化以降的我们西方传统中最优秀的思想和见解。这种课程主要提供美妙的维多利亚时代散文体的范例。普遍认为文学专业的学生应阅读的经典主要是英语作家，如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蒲伯、华兹华斯、丁尼生、阿诺德等，但外国文学通常也只是阅读英译本，就像今天美国大学用英文开设无以计数的‘西方文学杰作’课那样。这就意味着，经典中碰巧有用拉丁文、古希腊语或意大利语写成的，就具有可译性。无论口头上说得多么好，即要有一定的‘语言要求’，希望能直接阅读法、德或拉丁文，但实际上任何语言写就的杰作，皆能且已翻译成英文。直接通过原文阅读荷马、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或尼采作品的必要性并未得到承认”（128—29），比较文学在美国不断动摇固有的文学概念，在冷战时代建构了另一套文学观念。<sup>⑪</sup> 如此情势使我们明白了，冷战时代那些追求普适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表面上是要建构不同于反映论文艺学，实际上是要使西方白

人精英主导的价值体系及其所支撑的社会结构,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成为全球性大潮下,转化为彰显西方自由平等的战略,此举意外造成文学理论主流的方法仍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那些流行的文学批评方法虽然未必会生产出使人堕落的作品,却一直在寻找竞争对手。<sup>⑧</sup>对此,坎普夫和劳特尔《文学政治学:英语教学不同文章汇集》(1971年)讨论在冷战时代英文系英美文学教学中的政治学问题。随着冷战进程,萨瑟兰《英国大学1960—1984年间英文系政治学》(1985年)更认为,“在过去十年间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填补了英文系核心的意识形态政治真空,由此文学批评实践可能会得到再度振兴”(Sutherland 140),在此基础上他描述文学批评依赖学术制度和制度性语境、对政治进行批评的可能性、关注从文学作品到法律和社会理论等问题。尤其是卡勒《文学批评的未来》(1986年)认为,因学科扩张,“文学理论”课程内容扩大到包括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在美国大学里论及弗洛伊德的课程堪比欧洲,虽然英文系不是心理学系,甚至德国也不是这样,而尼采、萨特、伽达默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等常被文学课教师所讨论的程度,远超过哲学系教师,对索绪尔的重视程度超过语言学教师。<sup>⑨</sup>为实现政治诉求,在知识循环中不断膨胀着的西方文论,就日益借鉴其他学科内容,从而变得更复杂起来。

吊诡的是,刺激高科技发展和鼓励大学教育面向市场,本是要彰显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却导致文学批评实践成为文学教育的一种新社会组织状态,文学理论家的学术探索被当作智力工作的新社会形式、新职业官僚阶层的技术官僚劳动,文学理论从自洽学科变成特殊专业。在高泽西《文学的文化》(1994年)看来,“文学理论是投机的、衰落的职业,而文学则变得粗鲁、功利,文学理论和文学之间没有交集,但回首往事却发现,它们一直合作得很好”(Godzich 2—3)。但这种理论却能把欧美经典解释成普世性经典,“特殊作品(如《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的一般性影响力、在所在国家的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当然是伟大思想和文化的结果,应该像卢梭的爱好者那样清楚明了(从苏格兰作家鲍斯韦尔到马克思和当代学院派理论家亦然)。研究艺术对其受众的影响力,直面政治谱系是非常重要的,艺术放逐于学院话语,不可能归因于一些进步主义的形式”,并且这不是学院派中介在后台操作的,只是某个

流派在广义上的政治表达而已,这种政治行为抑制了我们对自身及文化研究,而沉默的国民就是这么做的”(Schwartz 77)。相应地,这套文学理论消解了传播西方经典的阻力,按佩尔《文学批评的失败》所说,“一些最杰出的批评家通常涉及文学理论时,总是要争论审美标准和体系,试图把特殊作品与广泛的文类相关联,或与民族传统、哲学方法相关联。较之于那些提供文学批评实践的人,他们则很少评论具体作品。具体的小说似乎不值得他们讨论,一般的理论家很少提供关于新作品的评价”(Peyre 322)。这类理论,在施林《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政治学》(2003年)和《文学与国际关系》(2007年)看来,“通过人员、经济、信息、贸易之流动的国与国之间关系,创造了友谊、合作和对立,对立产生各种需要订立减少冲突和促进合作的条约、协定、外交关系之各种动力。这就发生了在缺乏一个世界政府情形下的国际关系理念,这是一个用常识术语来说相对简单明确的研究和实践领域”(Sheeran vi),文学尤其是共同的文学理论,对缓解各国的紧张关系,有着政治外交所不能替代的功能。

如此一来我们就明白了,文学理论是冷战时代产生的,其背后自然隐含着某些复杂政治意涵,我们面对的只是作为学说的文学理论——科学主义的文学理论,或者人文关怀的文学理论,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则是西方政治正确被生活化、常识化的结果,但他们睿智地采用不同于苏联方式去面对剑拔弩张的冷战情势,即如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声言,“摆在我们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地抵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目前,即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它也只是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Bell 406)。如此情势,就使之选择不同于苏联让意识形态直接进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限制文学理论自由探索的做法,而是如韦勒克《文学理论》所主张的,文学不能代替社会学或政治学,但文学更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和目的。这种凸显“理论”的批评方法,在学院制度下产生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如《诺顿文学批评和理论文选》从第一版(2000年)到再版(2010年)就增加非西方批评之作(收录李泽厚《美学四篇》的片段),乃因正视西方文论在全球之影响力的大胆选择,而这种胸襟乃苏俄文艺学难以望其项背的。

总之,战后日新月异的文学理论,在冷战-后冷战时代以学说、大学文学教育的课程和学科方

式获得长足发展,它和苏俄文艺学一样,乃美苏对峙过程中各自以不同方式所建构的话语体系之一部分。在刚取得共同抵抗法西斯胜利不久,美苏为争霸世界,就分别制造话语体系——苏联强化或修缮反映论文艺学体系、西方则建构科学主义或人文关怀的文论,各试图使之普世化。这种在文学认知方式上的“分裂”,因冷战格局席卷全球——连试图中立的瑞士和新加坡皆无可幸免,或亦步亦趋遵从苏俄文论,或服膺西方文论,本身就自有民族审美传统的文学批评经验,在东西方阵营大部分国家中无不被荡涤而尽。直观上彼此不相干的苏联反映论文艺学和西方文论,通过对抗方式而互相关联在一起,并且各自掩饰着严重的知识链条上的断裂、道德上危机、伦理上紧张等。问题还在于,冷战时代制造出一批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和伦理批评家,并因此使得文学批评在冷战伊始就通过理论化而影响大众。至此我们也就清楚了,作为学说的文学理论在西方的丰富多样性,其发生、扩展和最终成为普遍知识,乃是冷战时代所支撑的西方学术制度和大学体制的产物。更重要是,同样是冷战产物的文学理论,为何最终是西方文论获得更广泛承认,而直接作为意识形态延伸的苏联文艺学,却比苏联解体更先一步失败,这不仅关乎作为学说的理论之优劣,更有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以及学术制度的深层原因——终究表明西方文学理论的国际政治学之功效,因为它的理论预设毕竟不是在表述上强化东西方文学之审美对立、凸显文学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矛盾,重视欧洲人文主义文学批评遗产,并兼顾到苏俄反映论文艺学所排斥的批评方法。相形之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在冷战期间仅仅是作为元素参与其中,且比重微乎其微;在后冷战时代,中国要建立具有普适性理论,是一个任重道远的目标,首先需要我们正视作为学说的文学理论和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及其与冷战相关的历史。

#### 注释[Notes]

- ① Stamiris, Yiannis. *Main Curr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A Critical Study*. Troy & New York: The Whitst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133 - 50.
- ② Feuillerat, Albert. "Scholarship and Literary Criticism." *Yale Review*, XIV (1925): 309 - 24.
- ③ Redfield, Marc, ed.. *Legacies of Paul de Ma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7. 179 - 83.
- ④ qtd. in Lehman, David. *Signs of the Time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Fall of Paul de Man*. New York:

Poseidon Press, 1991. 145.

⑤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34 - 35.

⑥ Gardner, Helen. *The Business of Criticis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9. 3 - 75.

⑦ 参见法国-美国文化批评家和政治理论家洛克希尔 (Gabriel Rockhill)《中情局阅读法国理论:论瓦解文化左翼的智力劳作》(*CIA Reads French Theory: On the Intellectual Labor of Dismantling the Cultural Left*), 28 Feb 2017, <<http://ift.tt/2m6tfnN>>

⑧ Derrida, Jacques. "Some Statements and Truisms about Neologisms, Newisms, Postisms, Parasitisms and Other Small Seismisms." *The State of "Theory": History, Art and Critical Discourse*. Ed. David Carro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71.

⑨ qtd. in Lotringer, Sylvère, and Sande Cohen, eds.. *French Theory 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2001.

⑩ Stosky, Sandra.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a Coherent Literature Curriculum: What Secondary English Teachers Can Do*.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2. xiii - xiv.

⑪ Williams, Raymond. "The Future of English Literature." *What I Came to Say*. London: Hutchinson, 1989. 150.

⑫ Guillory, John.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3.

⑬ Hall, Stuart.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Cultural Theory: An Anthology*. Eds. Szeman Imre and Timothy Kapse. Oxford: Blackwell, 2011. 72

⑭ Puillips, William. *Partisan View: Five Decades of the Literary Life*.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83. 121 - 36.

⑮ Natoli, Joseph, ed.. *Literary Theory's Futur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9. 5 - 6.

⑯ Cohen, Ralph, ed.. *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vii - viii.

⑰ 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⑱ Adams, H., and Leroy Searle, eds..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2.

⑲ Culler, Jonathan. "The Future of Criticism." *The Current in Criticism: Essays o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 Eds. Clayton Koelb and Virgil Lokke.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7 - 42.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rac, Jonathan, ed. *Postmodernism and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 . *The Yale Critics: D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 Barricelli, Jean-Pierre, and Joseph Gibaldi. *Interrelations of Literature*.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2.
- Bell, Daniel.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 [ Bloom, Harold.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Trans. Jiang Ning ka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
- Booker, M. Keith, ed.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Censorship, Revolution and Writing*.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14.
- 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 [ Cohen, Ralph, ed. *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 Trans. Cheng Xilin,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3. ]
- Culler, Jonathan. *Framing the Sign: Criticism and Its Institution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8.
- .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和批评》,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 ---.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Trans. Lu Y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8. ]
- Cunningham, Valentine. *Reading After Theory*. Oxford and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 2002.
-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 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 Eagleton, Terry. *The Idea of Culture*. Trans. Fang Jie.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 Fiedler, Leslie. "The Canon and the Classroom: A Caveat." *English Inside and Out — The Plac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Eds. Susan Gubar and Jonathan Kamholtz.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29 - 36.
- Gallagher, Catherine. "Blindness and Hindsight." *Responses: on Paul de Man's Wartime Journalism*. Eds. Werner Hamacher, Neil Hertz and Thomas Keena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204 - 07.
- Godzich, Wlad. *The Culture of Lite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Grishakova, Marina, and Silvi Salupere, eds.. *Theoretical Schools and Circles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Humanities: Literary Theory, History, Philoso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and New York: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0.
- Hoffman, Daniel. *The Harvar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Hohendahl, Peter Uwe. *The Institution of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 Laing, Stuart.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Literary 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s*. Eds. Deborah Philips and Katy Shaw.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5 - 24.
- Leitch, Vincent B.. *Living with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 Lotringer, Sylvere, and Sande Cohen, eds.. *French Theory 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Merod, Jim.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Criti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Muller, Heiner.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ism." *New German Critique* 16 (1979): 55 - 57.
- Olsen, Stein Haugom. *The End of Literary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Peyre, Henri. *The Failures of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 Redfield, Marc. *Theory at Yale: the Strange Case of D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 Rooney, Ellen. "The Literary Politics of Feminist Theor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Ed. Ellen Roon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73 - 96.
- Schwartz, Richard. *After the Death of Literature*.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heeran, Paul. *Litera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ories in the Art of Diplomacy*.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Ashgate, 2007.
- Siebers, Tobin. *Cold War Critic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kep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tamiris, Yiannis. *Main Curr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A Critical Study*. Troy and New York: The Whitst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 Sutherland, John. "The Politics of English Studies in the British University, 1960 - 1984." *Historical Studies and Literary Criticism*. Ed. Jerome J. McGann.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 Trilling, Lionel. *The Opposing Self: Nine Essays in Criticism*. London: Harcourt, 1955.

(责任编辑:王嘉军)